



THE
ENDS

权力的尽头

[美] H·R·霍尔德曼 著

OF
POWER

商务印书馆

权力的尽头

[美] H. R. 霍尔德曼著

唐笙、李森 等 译

郑 文 华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79 年 · 北京

H. R. Haldeman
with Joseph Dimona
THE ENDS OF POWER

NYT Times Books

1978

权力的尽头

[美] H. R. 霍尔德曼著

唐笙、李森等译

郑文华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黄冈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2 1/2印张 246千字

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7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统一书号：3017·242 定价：0.97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 H.R. 霍尔德曼从 1960 年帮助尼克松搞竞选活动开始，直到 1968 年竞选获胜后任尼克松白宫的办公厅主任四年多。他是尼克松的亲信、助手，追随尼克松前后达十余年，后因与“水门事件”有牵连于 1973 年被迫去职，还被判了刑。

本书 1978 年 2 月出版，主要是讲“水门事件”的前前后后，着重分析为什么象“水门”这么一个“三流”偷盗、窃听案件竟会升级、酿成一场宪法危机，最后竟迫使尼克松辞职下台。

阅读本书时可与本馆出版的《尼克松回忆录》等书对照起来看，对于我们了解美国政坛的情况会有一定的帮助。

参加本书翻译的同志有：唐笙（第一章）、李森（前言、第二章）、杜作辉（第三章）、唐建文（第四章）、刘觉传（第五、九两章）、石成慧（第六章）、陈尧光（第七章）、陶洁（第八章）和方廷玉（结论）。

献给莽，三十多年来，特别是最后的四年，是她使我懂得了“完人”一词的真实而又异常美好的寓意。献给父亲，他没能赶上共享荣华富贵，却也免受了一场苦痛。献给农、苏珊、汉克、彼得和安以及组成我亲爱的家庭的那个“整体”的其他成员。

鸣 谢

谨向在漫长而又艰辛的斗争中“保持了信心”的亿万美国人，特别是那些为数众多的、我本人的良友和家属，致以谢意。

谨向我有幸而且曾愉快地共过事的卓越的白宫工作人员，特别是拉里·希格比——自始至终是我的“得力助手”和忠实的朋友，致以谢意。

谨向以他的文学技巧将整个故事融成一体的约瑟夫·戴蒙纳致以谢意。

谨向使我一生的经历（尽管结局不妙）达到了顶峰的尼克松总统致以谢意。

作 者 的 话

xi

这不是1973年我离开白宫返回加利福尼亚以后开始撰写的那一本书。在忙于应付司法调查、大陪审团听证、国会调查、民事诉讼、起诉、审讯和上诉之余，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试图把我在尼克松主持白宫的岁月里的各种回忆——好的、坏的其他——汇集成为一部完整的回忆录，把我那段令人振奋和具有悲剧性的生活以及全国性的活动记录下来。

不少人在撰写有关水门事件的故事，尽管他们是站在另一方的立场上。我感到我的最大的贡献应该是阐述尼克松轶事的其余部分，而不是把水门事件再来一个故事新编。但是，水门事件的各种版本陆续出现以后，我感到令人焦虑的是，这些故事并没有真正地将水门事件完整地阐述出来。至于在我这一级和在白宫总统一级发生的一切事件，这些版本就更缺乏洞察力和更不了解内情了。

我当时希望而且设想，弗罗斯特在1977年春季电视采访尼克松能弥补这一不足之处，届时尼克松总统终将获得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直接谈话的机会。然而，在弗罗斯特采访专辑结束之后，我却发现，不但我的希望未能实现，反而在实际上进一步歪曲了事实，并使问题更加混乱不堪了。我至今还搞不清，究竟这是是否由于提问、回答还是剪辑所造成。不过，结果就是如此。

我当即决定把我的长远规划搁置一旁，专门去搞水门事件的真实背景情况。我现在深信，对于那次悲剧有比较清晰的了解是正确和全面地了解尼克松政府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xii 我并不心甘情愿这样做，因为我必须集中撰写有关尼克松执政期间的一次压倒一切的失败。我更乐意撰写关于他在执政期间的许多伟大的政绩。我在这里所写下的绝大部分事情，都是我本想弃之一旁置之不顾的，而我本来想要讲的一切，在这里却基本上没有提到。

因为水门事件是总统执政史上无可伦比的灾难事件，所以实质上它是一个消极的事件。因为水门事件是尼克松总统阴暗面发展的结果和表现，所以任何一本有关水门事件的书显然要反映这一点，而不会反映其光明面所表现出来的无数的、实质上更为有意义的东西。

水门事件情无可原。它的每一步骤和任何方面都是不可原宥的。然而，我希望能澄清许多时至今日还是神秘莫测的问题，并且为另一些这类问题提供新的真实情况。

这本书远非故事的全貌，即使就水门事件而言也是如此，否则就要卷帙浩繁。公开记录在案的资料有数千页之多，成书数十卷。我择其有意义的部分（往往是人所不知之事，虽然许多事情早已发表过）写成此书，因为这些段落对于全面了解水门事件的背景和当时的事实真相是必要的。我竭尽全力将我所知道的第一手材料和我从他人那里获悉的情况汇集起来，并且从中引出一些结论来。

在诸如民主党设置圈套论或是西恩富戈斯和俄中对抗等

问题上,我不得不依靠后来主管的人提供的、我在当时不知道的资料。

撰写这本书对我来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在四年多的过程中,我是审查和刑事诉讼的对象,因此,我本能地倾向于为自己辩护。同尼克松总统亲密无间地共事的那些岁月,使我更加倾向于用最美好的方式来描述他本人以及他的思想和行动。这本来是我当时在白宫的任务,它至今依然是我个人的强烈倾向。

我在白宫任职期间以及此后的年月里,人们指责我对尼克松总统盲目地忠诚。说我对他忠贞不贰,我是承认的,但我^{xiii}并不认为我是盲目的。我对他的忠诚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我清楚地认识到,我所服务的对象既具有崇高的美德同时也有严重的缺点。其结果是,我从未怀疑过我的忠诚的正当性。

这本书将会使那些和我有同感的人们深为不安,因为书中谈及不少“坏事”,对“好事”则谈得甚少。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争辩:坏事已被别人谈得够透彻的了,用不着再去加以重提或发挥了。他们会感到我所采取的态度使我上了“敌人”的圈套,从而证实了“敌人”所说的一切。

我的本意并非如此,而且我相信也不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我深信,本书的正直和公正的读者们,不论他过去对水门事件和我们这些卷入其中的人抱有何种看法和怀疑,都会发现,本书对于了解真正发生过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是会有一些帮助的。要做到这一点,而不去承认和面对许多重大过失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我今天对曾经为之服务的总统的忠诚，并不亚于当年。我确信这本书是我的忠诚的宝贵献礼和剖白。

但是，我认为，为了真理的事业和历史的利益，最好还是正视那些构成整个问题一部分的消极的和煞风景的方面，并且在介绍它们的时候争取不脱离问题的积极方面——这是我始终为之奋斗的方面。

要做到这一点，我不得不绞尽脑汁来发挥我所谓的关于水门事件的“魔鬼的论点”。我迫使自己去思索每件事的最坏的解释，而不是考虑它的最好的解释。从这一观点出发，试图把问题的全貌拼凑起来。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摒弃了一切与我所知的真相不相符的结论和设想。我只从最坏的角度去考虑那些可能发生疑问的事情，然后反回来得出一个合乎情理和全面兼顾的结论。

xiv 我愿意承认，我过去所采取的坚定不移的态度与现在所采取的态度截然相反。故事中涉及的许多人士我都颇为熟悉，并且曾与之亲密地共事过，因此，采取这样一种完全相反的态度是困难的，然而，我确信，这是一次建设性的尝试。

同我合作撰写此书的约瑟夫·戴蒙纳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协助我不要偏离这条轨道，对我的全部见解提出质疑，并且防止我坚持那些自我满足，但可能是自我蒙骗的结论。

显然，我们之中有些人办了一些错事。我认为，所有这些卷入了水门事件的白宫工作人员都做了许多错事。有些是犯了罪的、有些则并未害人，有些是明知故犯、有些则是偶然为之的，有些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些则是愚蠢的疏忽，但是，所有这些事都做错了。从我所处的有利地位来回顾所发

生的一切，我希望我能对最终解开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迷团之一有所贡献。

要了解水门事件，就有必要了解有关白宫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有那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有危机事件才由白宫处理。只有那些下级机构无法处理的事情才送到白宫来。总统和他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而是只处理那些高级和更高级的事务，有时是最高级的事务。水门事件伊始，本来是一件属于低级的问题，因此，直到它在外界升级为一项高级事件之前，最高机构白宫并没有插手。

对我来说十分遗憾的是，这本书把极大的注意力集中在同水门事件有关问题的枝节方面去了，因而不可避免地歪曲了主题。其结果是，几乎完全忽视了我们在那些日子里到底做了些什么、怎么想的以及忧虑些什么。直到1973年3月，我们才将注意力集中于水门事件，并且用了六个星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在此之前，水门事件从来不是我们思考、讨论和采取行动的主要问题。

在本书中，我试图使读者略微了解一些我们当时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事情。其中最主要的事情却从未被人们提及，因为它是例行公事。简而言之，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管理政府^{xv}的日常工作——而这项工作本身就是整天干也干不完的事。各类事务、问题、决定以及新的想法等等，川流不息，没完没了。

除此以外，水门事件是在我们设法结束越南战争的时刻发生的，那时我们正全力以赴，有不少时候甚至搞得焦头烂额。那时，访问中国和俄国的惊人而又十分疲劳的旅行刚刚

结束，还在处理后继事宜；那时，我们正在考虑落实全面改组行政部门的计划；那时，我们也正在为拟定和执行总统第二届任期的基本政策和新立法步骤而进行着设计、研究、修订、试验以及筹备等工作。

除了上述各项工作——沉重的正规的日常工作、有关越南和平的大量的额外负担、最高级会议的继续、改组工作以及筹划第二届任期需要采取的新步骤——我们忙于竞选连任运动的党代表大会、竞选连任运动本身以及此后的总统就职典礼等等。

在谈及 1973 年 3 月以前有关水门事件的活动时，本书仅就 1972 年 6 月至 1973 年 2 月的二百五十天期间中有关的十天，作了一些报道。换句话说，这些报道并未把我们在占这段时间 96% 的日子里所想和所做的一切包括在内。甚至在我们为水门事件奔波的那十天中，我也把占每天 90% 以上的活动放在一边不提，因为这些活动与水门事件无关。

之所以罗列这些统计数字是为了说明，水门事件不是尼克松总统任内的全貌，即使在所谓的水门事件时期也并非如此。我真希望有足够的篇幅能至少罗列一下那个时期所有的其他会议、谈话、问题、旅行、决定、灾难和胜利。

我在欧文委员会上的开场白声明中提及，透过一架高倍显微镜去观察一只苍蝇的眼睛是很可怕的。不幸的是，这本书不得不把一只特定的苍蝇的眼睛放在高倍显微镜之下，观察起来当然是可怕的了。从长远看来，为了形成一个符合事实的看法，必须统观全局并加以权衡。但是，就本书而言，我们将用显微镜去集中观察。

关于本书中出现的总统或其他人的直接引语，我要加以说明。这些引语来源广泛：有些来源于已发表和未发表的白宫录音带的笔录；有些引自一些发言或其他声明的公开记录；有些是根据我在那个时期所做的记录进行整理的；有些则只是根据我的回忆、我对有关材料和事件的回顾，以及其他后人后来的报道，尽我最大的努力对当时所说的话进行追记而已。虽然我不能断言这些引语字字无误，然而我深信，它们是当时所说的话的合乎情理的追记。

对直接来源于录音带笔录的引语，我并没有逐句加以注明出处，因为同我用其他方法进行追记的引语相比，笔录的引语不见得就更为确切地表达了当时所说的话。录音带的笔录并非完美无缺。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在某些问题上，我引用了通过其他各种方式了解到的资料——时间一般是在事情发生很久以后。因此，不能说它是我的第一手材料，不过我认为这些资料对于全面了解主题是重要的。我十分感激同我合作的约瑟夫·戴蒙纳所进行的广泛的研究工作，它是这些宝贵的附加资料的主要来源。

我对某些事情的报道以及我对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所得出的结论，与其他同样卷入了这一事件、也同样在场的人士的说法必然有所不同。有些地方出入很大，有些则不过是细节上的差异而已。如果全部事实都清晰易辨，那里还会有什么水门疑案之可言呢，而大家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以及肇事的原因不也就会取得一致的见解了嘛。最终的定论有待于把所有的见解汇总起来，然后彼此加以权衡，再同已知事实加以对

照评定，最后同逻辑和推理所得出的最好的判断加以对照。也许永远也不会有那么一天，不过，我希望本书能为达到此目的做出贡献。

将这部特殊的文化遗产留给我的子女并不使我感到愉快和自豪。我希望有朝一日能有精力和时机将我目睹的尼克松总统任内的其他事迹撰写出来，那才是主要的、有意义的部分，其中当然要写成绩也写缺点；而不是象本书这样非集中描绘完全消极的方面不可，从而使尼克松总统任内的业绩遭到巨大的歪曲。

我希望，这部对水门事件的研究以及对这一事件的背景的剖析，将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这次事件怎么会发生的，从而也许会原谅我们这些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

H. R. 霍尔德曼

前 言

xix

理查德·尼克松首次就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四个星期以后，为了一件十分特殊的事情，我离开了华盛顿。在1968年整个竞选的过程中，我不停顿地旅行，然后，在纽约度过了交接的过渡时期。因此，在一年当中很少见到我的家人，直到1969年晚些时候他们才迁到华盛顿来。

1969年2月19日是我们结婚二十周年纪念日。我启程返回洛杉矶的家里去，以便同莽和几位密友欢庆这一纪念日。

考虑到这一年的双重意义，莽给我精心安排了一件出我意料之外的周年纪念礼品。她背着我，通过负责安排总统约会的秘书德怀特·蔡平，请新就职的总统亲笔书写了他的就职演说中的一段语录。莽知道这段话对我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段语录是写在印有总统印玺浮雕的漂亮的假羊皮纸上。莽把它镶上了镜框，至今还悬挂在我书房的墙壁上。

除此以外，还有莽自己的礼品，她亲手做了一本美丽的就职典礼的剪贴簿，封面上嵌有“完人”两个烫金字。这几个字取材于尼克松的就职演说中的一句话：“一个不从事比自己雄伟的事业的人，就不算是一个完人。”这句话总结了我对尼克松总统服务的意愿，以及我为有机会这样做而感到巨大的满足。

然而，我为之服务的“比自己雄伟的事业”又是什么呢？

即使象我的妻子这样接近我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自然臆测也会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以及他所代表的纲领和政策。我在白宫的时候，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大约也会如此作答。然而，如果我真正进行了周密的思考（我后来的确这样做了），
xx 我的回答则会迥然不同。

我为之服务的“事业”既不指总统这个职位，也不指理查德·尼克松本人。我的“事业”是二者独一无二的结合体：尼克松总统。我怀疑，如果换一个人做总统，我是否会为他服务。我也怀疑，如果理查德·尼克松不谋求当总统，而且后来又当不上总统，我是否会为他服务。赢得了我的忠诚、精力并为之鞠躬尽瘁的，既不是总统这个职位，也不是尼克松本人，而是二者的结合体。

我不是一个政客。在我自愿参加尼克松的竞选活动之前，我对政治毫无兴趣，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活动。我也不是理查德·尼克松的崇拜者。除了配合他在政治方面做些努力之外，我并无意与他共事。在他离职并且不再谋求其他公职以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

在为理查德·尼克松断断续续服务的二十年当中，总计起来我为他全力以赴地服务了七年多。在这些年月里，我极为欣赏和尊敬他的伟大——我强烈地意识到他能够为美国以及稳定的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我曾强烈地感到，凡是我所不喜欢和不同意的方面，都被他能做好事的素质所彻底压倒，以至我认为同他这个善恶兼有的人一起共事是十分值得的。

我对他的阴暗面并没有视而不见，但我也没有因为他有

阴暗面而灰心丧气。虽然这些阴暗面的确曾给我和其他人员造成过很大的问题，我认为，相对来说，它们并不重要。

我认为我的使命和机会是独特的。我感到我可以在一出我坚信会获得巨大成功和成果的戏剧里扮演一个极为特殊的角色。我愿意接受随之而来的损失，作为必需付出的代价。

我力求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这一事业之中——并且愿意在我认为最能起作用的幕后进行工作。我自己对权势毫无兴趣，也根本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我仅仅行使了我的职位所赋予的权力，而且是按照我认为会给尼克松总统带来最大好处的方式和目的行事。

xxi

我之所以心满意足并不是由于个人有权势和荣誉，而是由于我确实意识到在尼克松总统日常发展和行使总统职权的过程中，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我明明知道，我当时做出了极其现实和富有建设意义的贡献，但也有少数人甚至对此表示怀疑。人们不时对我所起的作用和我所做的贡献加以曲解，对此我并不介意。只要我认为事实真相是积极的，而且我认定事实就是如此，至于别人怎么想，那是无关紧要的。我从未公开出面代表政府讲话，也不想这样干。

我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我能否配合总统一一起工作，并且在政府内部工作——完成任务，防止一些事情发生，直接对总统负责。至于对外界作解释，则让别人去干。一个总统助理就应当如此工作，而且也必须如此工作。如果一旦他本人变成一个知名人物或者成为一个公众所议论的人物，那么，他的有效作用如果不是完全丧失的话，至少也会大为减色。